



基于恐惧、误传、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应对措施，不会将人们从类似新冠肺炎的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。



伦敦城市大学农产食品政策教授蒂姆·兰透露，英国无论从劳动力还是食品供应上，早就做不到自给，该国有30%的食品直接进口自欧盟国家，11%的食品来自那些与欧盟有食品贸易协议的第三方国家，同时农业里的一大批子行业（如草莓、覆盆子等采摘）完全倚赖六七万名欧盟成员国工人，光靠英国自身力量实施管理和检疫是不可想象的。“有些右翼政客说用不着担心，因为我们会有机器人，但是，这至少也得等上15年……”兰嘲笑说，英国名义上脱离欧盟，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，至少一年多，英国仍是“准欧盟成员”。

事实上，“人群隔离”与“信息共享”“资源统筹”正交织于这场特殊的战争里，并产生出迥异于以往的情景。在韩国，累计确诊病例在3月2日突破4800例，总统文在寅宣布将传染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的“严重”级别，大幅强化防疫应对体系。而多达2.8万人的驻韩美军将风险预警调至“高级”，禁止官兵到疫区出差，严禁外部人员出入自身基地，美韩甚至取消部分联合演习。而在韩国的邻邦中国和日本，则出现“共克时艰”的动情一幕，当中国1月份出现疫情时，日本第一时间空运援华医用物资，而当几周后日本发生疫情变化后，中国又向日方紧急提供一批病毒检测试剂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，“同日方共同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安全挑战，既是我国发挥负责任大国担当、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一环，也是我们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。”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这样强调。

施，当船上所有人在40天后还保持健康，才被允许上岸。经几个世纪演变，这一模式的基本思路定型了：在存在传染病的现实风险下，将潜在携带者的行动控制足够长的时间，从而确认他们是否被感染。这种减少风险的措施很有意义，但付诸实践却要面对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及心理难题。

在今天人流、物流高度密集的社会里，通常情况下，采取医学隔离措施会较为敏感。这里有一个悖论，即隔离干预越早，公众就越不可能对疾病造成的危险产生广泛认识，隔离造成的成本和负担就越可能产生争议（有点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的意思）。而在已实施的隔离措施中，时间上的延长也会造成受约束人群心理上的微妙变化。

传染病社会学研究创始人菲利普·斯特朗发现，传染病易引发三种流行趋势，“当出现感染病例，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心无人幸免；第二个反应是把危机当作寻找‘替罪羊’的机会，进而产生意识上的误判；最后必须对危机‘做点什么’，不管这是否具有理性”。实际上，**传染病在破坏身体的同时，也威胁着社会的秩序感、信任感和稳定感。**20多年前，某独联体国家曾有一项“后疫效应”的心理调查，隔离头三天，被隔离观察者中恐惧情绪的比例最高，达到60%以上，而影响更深远的悲观忧郁情绪的占比却是个位数，但当时间延长到两周后，两者比例却实现逆转，进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直到社会情绪。这

2月1日，米兰市议员Tajani和Confcommercio企业协会秘书长Barbieri应中国企业代表Francesco Wu之邀，前往米兰华人街用餐，以证中餐无病毒。

勿造作茧自缚的牢

“一旦暴发新的疫情，现代医学可以提供一些保护，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没有疫苗预防，也缺乏治疗药物，精准而配套的隔离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世界安全。”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布赖恩·沃尔什注意到，现代医学里的“隔离”一词，正好来自意大利语“Quaranta Giorni”，原为“40天”之意，系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对疑似携带瘟疫的船只及乘客采取的约束措

